

白银图书奖

葛亮

《北鸢》

·虚构类

溯源

“我更关注的是,把历史人物还原为人”

本报记者 陈淡宁

很多杭州读者还记得——2016年深秋,一场受台风影响的大雨里,葛亮准时出现在钱报读书会的现场,与同样不顾大雨前来的读者,分享他的新书《北鸢》。

《北鸢》距离葛亮上一部长篇小说《朱雀》出版,已过去7年。7年中,他有3年在做案头工作:格物、考据。这个过程,也是葛亮建构史观、不断打磨对历史表达的立场与观念的过程。

去年那场读书会上,很多读者得知,葛亮的太舅公是陈独秀,表叔公是中国“原子弹之父”邓稼先,祖父是著名的艺术史学者葛康瑜。《北鸢》有对家族史的回溯,只是,葛亮的写作,是将历史人物还原为人。

历史都是“毛茸茸的”

钱报记者:《北鸢》中,你印象最深的人物是谁?

葛亮:我自己印象较深的,是褚玉璞——历史上确有其人。他是我外公的姨夫,当时是直隶省长兼军务督办,我外公就是在他那里成长的。

我在写这个人物的时候,实际是有某种难度的。因为要依允家族内部历史,去重新勾勒这个人物。当时家里老一辈的人,对我有一个忠告:怎样写这样的人物?就是把国事当家事写。

一方面,他在中国的近代史上,算是曾经指挥方遒,纵横捭阖的人物,秦瘦鸥在塑造他时,也更多表现了这方面。而我更关注的是,把历史人物还原为人的过程,还原到家庭本位的过程,他是一个父亲,一个丈夫,也是一个姨夫。

我之前也讲过,真正打动人的是人之常情。这句话不光是应用于小说创作,所有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层面都是这样,所以我会更关注他作为人的细微处甚至是脆弱处。

后来我花了一定篇幅,勾勒他在北伐情势聚落之下,一种实际上在正史里不太会触及到的人生境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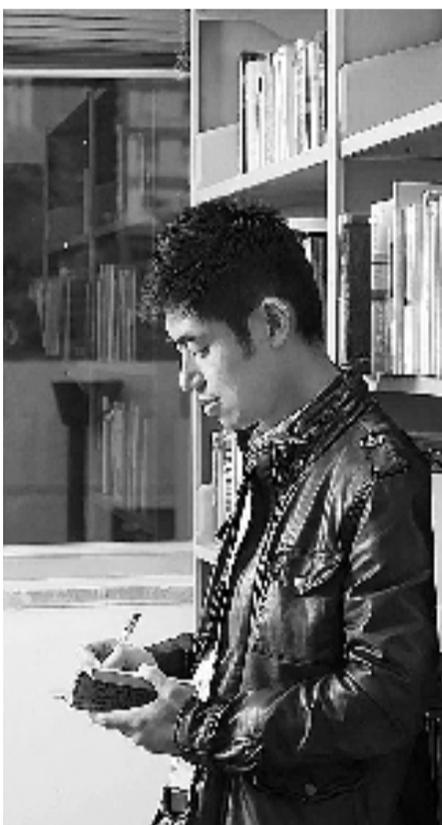
我相信我笔下的褚玉璞,和在前辈作家作品中看到的,无论是在面貌还是整体性情与气质上,都是不一样的。一方面是因为从家庭内部出发的表达,会有不同的层面和角度,更重要的是,把他还原成人本身的意义所在。

钱报记者:每个人的家族史,宽度都是有限的,个中人事是否足以支撑一部长篇小说的容量?而在《北鸢》之中,人物纷繁,军阀、草寇、商贾、女佣……对于这些人物的创作,您心中是否具有某一种择取的标准?

葛亮:小说的原型实际上涉及到3个家族,我的外祖父,是一个资本家家庭,外祖母,是一个仕绅家庭,还有我的祖父,是皖南一个知识分子世家。所以整个家族史的纬度还是丰富的。但也因此有非常多的人物需要取舍。我取舍的标准,其实是人性的温度。

民国是非常动荡的一个断代,动荡对人性是极大的考验。但同时也最能表现出每个人的可能性。这种可能性是我希望从小说的角度去表达的很重要的文化空间。在这种探寻中,可以触摸到时代的脉搏和温度。

所谓的历史,我之前有个形容,叫“毛茸茸的历史”,它绝非条分缕析、规整严正的大叙事的格局,它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细节,这种细节收藏了有关于人性的温度,有关时代最幽微的地方,同时也是最需要我们以细节为路径去深入、去触摸、去把握的时代肌理之处。



葛亮,1978年出生于南京。如今是香港一所高校的副教授。他的《相忘江湖的鱼》曾获2008年香港艺术发展奖,他的《谜鸦》获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、台湾梁实秋文学奖等多个重要的文学奖项。

写小说去触碰祖辈的人生

钱报记者:您最喜欢的人物是哪一个?

葛亮:我内心层面,最喜欢的还是主人公文笙。大家也可以感觉到,相较其他角色,他的人生并不跌宕,甚至并不是一个非常投入于时代和生活的人。

这种表达,是因为跟这个人物原型——我的外祖父性格有关。他是非常淡和的人物,也很包容。恰恰是这样一个角色,在我书写一个时代的见证者时,特别有意义。他面对时代不会僭越,同时对人性有体察和包容心,他见证了别人的风景和开阖,但他自己的人生轨迹并没有因此发生大的改变。从我的角度来说,他实际上是一个中正的时代谛视者和体察者,他的冷静对于我客观地去表达时代非常有意义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他非常像《老残游记》里的老残。文笙看待那个时代的视角,因为温和,赋予了温度,他能看到人性里的美好之处。

序言中我也讲到外公身上令我钦佩的一点,他对时代有包容与和解之心。他出身资本家家庭,后半生也遭遇了动荡和磨难,但他始终有这样的心态。这使他安然度过一生,保持良好的心境与人生状态。



钱报记者:《北鸢》对您以及这个时代的意义何在,您想过没有?

葛亮:《北鸢》深入到家族肌理中,对于我,或者对于时代都是有意义的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来处,每个人都有求本溯源之心,当我通过小说触碰到祖辈的人生过往时,那种感觉相当美好。通过他们的人生去把握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的脉搏和温度,感知在一种风云跌宕之下,每个人都拥有发现机遇、自我选择的权利。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。同时我也想通过小说,表达我对中国文化格局的体认和观察。

这部小说与《朱雀》合称“南北书”。中国的文化版图丰富博大,从空间角度来说也存在分野。我们时常说“北望家国”,北方更多的是一种“土”文化,政权和文化处在稳固的核心地位,而南方文化更像“水”,多元、开放、离散。当你真正深入到这种文化肌理中,你会发觉这种分野是相当有意味的。游弋于其中,这种丰富性,会延伸出多义性和开放性。

《北鸢》中,居于中国空间不同位置的城市,北方的天津、中部的襄城、南方的上海,在文笙生活经历的贯穿之下,有了交叠、交缠、互动,产生文化上的广度。这是我非常想要去呈现的部分。